

从变异学角度再审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

ON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ANCIENT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VARIATIONOLOGY

付飞亮

Fu Feiliang

西南大学文学院

School of Literature, Southwest University

摘要

反对“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或认为“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是伪命题，大多数是源于对失语症的误解。通过梳理史实，可以发现古代文论确实有现代转化，其转化的方法就是变异。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可采取三种方式：一是遵循“依经立义”的话语规则，重读经典，使其在现代语境中产生新意；二是在遵循中国传统话语规则的前提下，以中国古代文论为主，主动引进一些外国文论，并对其进行“他国化”，作为中国文论的有机组成部分；三是主动将中国古代文论输出，使其在国外发生变异，创造理论旅行后的回归。

关键词：中国古代文论 失语症 变异学 依经立义 理论回归

Abstract

The disapproval of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Ancient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or taking it as a meaningless issue, is based on the misunderstanding of “aphasia”. With a review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we can trace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ancient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and the transformation takes place by way of variation. We have three ways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Ancient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Firstly, to re-read the classic works by following the discourses rule of “conforming to the classics and bringing forward one’s own points”, and it will generate new ideas in the modern context; Secondly, to introduce foreign literary theory actively and “foreignize” it, and integrate it as part of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with the preposition of abiding to the rule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discourses and emphasis on the ancient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Thirdly, to export ancient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actively so as to make it mutate abroad, creating a “return of traveling theory”.

Keywords: Ancient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Aphasia, Variationology, Establishing meaning according to the Confucian classics, The return of traveling theory

引言

曹顺庆（Cao, 1995）先生在二十多年前指出中国文学理论患上“失语症”，旨在重建中国文论话语，倡导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正如对失语症的争论一样，对顺承失语症而提出的“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命题，学界从1996年10月，由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和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在西安联合召开的专题学术研讨会开始，就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陈雪虎（Chen, 2003）认为，学者们的观点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支持或以支持为主。这一派学者众多，主要有童庆炳、钱中文、陈伯海、杜书瀛、张少康、党圣元、郭德茂、蔡仲翔、梁礼道、刘保忠和张海明等先生。虽然各位学者的论述角度和用力点各异，但总体上对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是持赞成态度的。第二类，反对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或以反对为主。主要学者有陈洪、沈立言、王志耕、陶东风、相福庭、张峰屹和罗宗强等先生。第三类，认为“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是伪命题。陈雪虎（Chen, 2003）指出，主要学者有蒋寅、郭英德和胡明等先生。第一、第二类观点一般是在承认失语症的前提下展开的，而持第三类观点的学者一般也否认失语症或认为失语症是伪命题。

对于后两类观点,学者们早就做出了有力的批评,尤其是对第三类观点。如蒋述卓(Jiang, 2008)指出,童庆炳就以翔实的证据驳斥了胡明、郭英德在现代与古典之间人为制造的“不可通约性”。其实许多反对“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的学者,还是源于对失语症的误解。曹顺庆(Cao, 1996)指出,失语症的实质“并非指现当代文论没有一套话语规则,而是指她没有一套自己的而非别人的话语规则。”何谓话语规则?曹顺庆 & 王庆(Cao, 2008)指出,话语规则是沟通得以实现的基础,是指在一定的文化传统、历史背景、社会语境中约定俗成的语言和意义建构的法则。中国传统的固有文化规则主要有两个,一是以“道”为核心的意义生成和话语言说方式,另一个是儒家“依经立义”的意义建构方式和“解经”话语模式。“失语”其实是指失去了固有的具有民族性的意义生成和话语言说的文化规则。中国文化规则的丧失,并不是自然发生的,而是被西方强势文化挟经济、政治、军事等之威而强行中断的,而造成我们文化的失语。恢复中国传统文化话语规则,对古代文论进行现代转化,是治疗失语症的一剂良药。

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并不是说要恢复古代文论的一系列话语范畴,而是要续接上传统的血脉,恢复古代文论的文化规则。古代文论中的范畴“风骨”、“神韵”、“比兴”、“妙悟”、“文气”等这些话语表层的东西可能死亡,但是支配范畴的深层的、潜在的文化规则仍然存在。

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已成为大多数学者的共识,正如童庆炳(Tong, 2002)在《再论中华古代文论研究的现代视野——兼与胡明、郭英德二位先生商榷》中所说:“中国文论中古今关系问题已经取得了比较一致的答案,那就在古今对话的基础上,进行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但至今未有从学理深层去论述古代文论为什么可以转化,以及怎样转化。笔者拟从变异学视角来阐释古代文论现代转化。

依经立义,重读经典

变异性是曹顺庆(Cao, 2005)首先提出来的,要求从“变异”的角度出发,从以前比较文学文类学研究的“求同”思维中走出来,从而拓宽文类学的研究视野。曹顺庆 & 李卫涛(Cao, 2006)认为,变异学将比较文学的跨越性和文学性作为研究支点,通过研究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学现象交流的变异状态,以及研究没有事实关系的文学现象之间在同一个范畴上存在的文学表达上的异质性和变异性,从而探究文学现象差异与变异的内在规律性所在。曹顺庆(Cao, 2006)认为,变异学是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重大突破,通过研究不同国家、不同文明之间文学交流的变异状态,来探究文学变异的内在规律,重点在求“异”。

恢复传统的话语规则，是解决失语症的关键。从变异学视角来看，中国传统的话语规则之一——“依经立义”，其实并不像想象中的那样僵化、保守，而是在一定的限度内有所突破，有所创新。

“依经立义”的话语规则虽然要求以“原道”、“征圣”、“宗经”的思维模式和“以意逆志”的解读方式对经典进行“注”、“疏”、“传”、“正义”、“笺”等形式的操作，因而让我们觉得保守、僵化，但是，“注”、“疏”、“传”、“正义”、“笺”等，本身都是对“经”的变异，是对“经”的个体的、独特的体悟和解释。限于时代与环境的不同，学养的差异，阐释经书者必然会认为自己的解释才是最正确的，前人或旁人的解释都是错误的、有偏差的。于是纷纷著书立说，驳前人，批异见，成一家之言。汉儒提倡“诗无达诂，易无达占，春秋无达义”（董仲舒《春秋繁露》），正如张隆溪（Zhang, 1983）所说：“一旦承认诗的语言不能照字面直解，也就不可避免地为各种解释打开了缺口。”晚明韩廷锡（Han, 1986）也说：“注有二法：一训经，一发经。……发经者，借经文以写自己见识，读之若一字无与，于经者统而会其大意，则字字与经相长也。”所谓“发经”，是用自己的体验和感悟来阐释经书，必然会感染时代的风气，有个人的趋避，难免会与原经书意义相离，即所谓的误读，产生变异。不论是“我注六经”，还是“六经注我”，原初意义上的“经典”都必然会发生变异。例如，中国不同历史时期对《诗经》的不同解读，其实就体现了一种变异的过程。解读发生变异的原因也许正如闻一多（Zheng, 2002）先生所说：“汉人功利观念太深，把《三百篇》做了政治的课本；宋人稍好一点，又拉着道学不放手——一股头巾气；清人较为客观，但训诂不是诗；近人囊中满是科学方法，真厉害。无奈历史——唯物史观的与非唯物史观的，离《诗》还是很远。明明一部歌谣集，为什么没人认真的把它当文艺看呢！”

中国古代文论中的一个重要范畴“意境”，对其内涵的解读其实也经历过一个不断变异的过程。从王国维、宗白华、童庆炳、直到现当代诗论，对意境的阐发皆有变异。意境产生于先秦道家的“体道”的境界，最早的意境基本上是一种人生哲学。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刘勰把哲学的命题转为文学理论命题。唐代的王昌龄明确提出“意境”概念，明清时代已被普遍使用。现今学界一般都公认晚清王国维是意境研究的集大成者。王国维（Wang, 1997）在托名樊志厚撰的《人间词乙稿序》中说：“文学之事，其内足以摅己而外足以感人者，意与境二者而已。上焉者意与境浑，其次或以境胜，或以意胜，苟缺一，不足以言文学。”王国维一方面承袭了传统的情景交融的意境说，另一方面又加入了自己新的理解，以“有我之境”、“无我之境”、“造境”、“写境”等丰富了意境（境界）的内涵。所以王国维（Wang, 1940）敢于自诩自己是意境（境界）的提出者：“沧浪所谓‘兴趣’，阮亭所谓‘神韵’，犹不过道其面目，不若鄙人拈出‘境界’二字为探其本也。”

宗白华认为意境是介于学术境界和宗教境界之间的艺术境界，即“以宇宙人生的具体为对象，赏玩它的色相、秩序、节奏、和谐，借以窥见自我的最深心灵的反映；化实景而为虚境，创形象以为象征，使人类最高的心灵具体化、肉身化”。宗白华（Zong, 1981）进一步阐发：“艺术家以心灵映射万物，代山川而立言，他所表现的是主观的生命情调与客观的自然景物交融互渗，成就一个鸢飞鱼跃，活泼玲珑，渊然而深的灵境，这灵境就是构成艺术之所以为艺术的‘意境’。”童庆炳（Tong, 2002）在《“意境”说六种及其申说》一文中认为包括王国维和宗白华等在内的学者在讨论意境问题时，没有把意境理解为一个复合的结构，没有完全把握住意境的主要的美学内涵。他认为意境是人的生命力活跃所开辟的、寓含人生哲学意味的、情景交融的、具有张力的诗意空间。这种诗意空间是在有读者参与下创造出来的。

以上众人对意境的说法虽然有差异，但从整个中国古代文论的历史来看，其都立根于传统话语，以个人的生命体验渗入，不断阐释生发出新的意义，亦即是共同参与“意境”意义的增殖与建构的行为，从而使意境这个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特有的范畴能直接运用于当下，能保持持久不衰的生命力。

因此，真正仔细审视历经千年的学术流变，可以发现，所谓不变的“经”其实只是一种理想的状态，真正“不易”的“经”是几乎找不到的。曹顺庆 & 王庆（Cao, 2008）指出，“依经立义”其实也是知识生成和积累的重要方式。每一时代对“经典”的重读，都参与了这一知识的创造与积淀的历史。德国哲学家Hans-Georg Gadamer（Hans, 1999）认为，理解就不只是一种复制的行为，而始终是一种创造性的行为。因此，在当下新的话语环境中，运用传统的“依经立义”文化规则，对中国古代文论进行再解读，就是一种变异创新，即现代转化。当然，由于是同一文明、同一文化圈、具有相同的文化传统内的变异，所以变异的幅度一般较小，故常被批评为琐碎的修补，被认为没有实质性的创新。此种观点有缺公允。因为只要是哪怕最细微的变化，也不可抹杀其积极意义。

主动引进，以化他国

另外，从变异学视角来看，引入西方文论，作为一种异质文化，与中国古代文论相碰撞，也会产生变异，产生新的理论，即古代文论的一种现代转化。当然，这里大致会有两种情形。第一种情形是以西方文论来套中国古代文论，割裂了传统的话语规则，造成了中国文论的“失语”现象，这是至今为止中国文论界最严重的一种不良倾向，虽然近年已经有所好转，但沉痾已久，情况依然不容乐观。曹顺庆 & 邱明丰（Cao, 2010）认为，其典型表现就是中国古代文论的“学科化”、“体系化”、“范畴化”。即使是享有盛誉的王国维的《红楼

梦评论》、朱光潜的《诗论》和刘若愚的《中国文学理论》，也存在以西方理论套用中国古代文论的倾向。《红楼梦评论》断言《红楼梦》是一彻头彻尾的悲剧，与中国乐天的文化精神完全相反；朱光潜说中国由于没有哲学，所以没有真正的悲剧；刘若愚借用美国文论家艾布拉姆斯的四要素理论将中国文学理论划分为“形而上的理论”、“决定的理论”、“表现的理论”、“技巧的理论”、“审美的理论”、“实用的理论”，并认为《文心雕龙》中没有决定论。曹顺庆（Cao, 2007）认为，以上三者皆属以“西学为体，中学为用”的错误指导思想来硬套中国古代文论的“失语”。这种“失语”虽然也是一种现代转化，是一种变异，但是要坚决摒弃。

第二种情形是虽然引进了西方文论的一些理论成分，但是仍然遵循“依经立义”等传统的话语规则，以中国的古代文论为主要骨骼，以西方文论作为一种辅助的材料，对西方文论进行“文学的他国化”。对西方文论进行“他国化”，中国古代文论自然会在原来的基础上有所创新、有所发展，这也是应该提倡的一种现代转化方式。在中国历史上发生的佛教“他国化”（中国化）成为禅宗即是典型的例子。近现代的较成功的案例还有王国维的《人间词话》、钱锺书的《谈艺录》和《管锥篇》等。《人间词话》采用“以词谈词”的传统的方式，用“造境”、“写境”来化用“理想”与“写实”，用“无我之境”、“有我之境”化用“优美”与“宏壮”等西方的理论；《谈艺录》、《管锥篇》以富有民族特色的“疏”、“传”、“笺”、“正义”、“诗话”等形式为构架，时不时信手拈来一些外国资料当作辅料。王国维和钱锺书虽然都受过西学的熏染，但都在相当程度上实现了外来文论的“他国化”。

主动输出，理论回归

古代文论的变异，还有一种特殊的情况，即流传至外国，与完全异质的文化发生碰撞，从而发生令人意想不到的变异，产生新的东西。即中国文学理论在与西方文论的碰撞中出现的“激活”问题。曹顺庆（Cao, 2008）认为，话语在变异中被“激活”后，会产生新的东西。这也就是变异学中所说的文化过滤与文学误读。曹顺庆（Cao, 2006: 99-106）指出，文化过滤指文学交流中接受者的不同的文化背景和文化传统对交流信息的选择、改造、移植、渗透的作用，也是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发生影响时，接受方的创造性接受而形成对影响的反作用。文学误读是因为文化过滤而造成的误读。”这些从中国流传到外国、但又发生变异的理论往往会被重新引进到中国，并被中国现当代学界所接受。

这种情形可找出不少例子。如有些西方文论的来源是中国古代文论，然后又被介绍到中国。因此，回到中国的，其实是中国古代文论他国化（被西方化）的结果。如法国哲学家

(Jacques2005)受中国文字的启发,认为中国文字是表意文字,声音与意义是相分离的,所以中文模式反而明显地打破了逻各斯中心主义。当然,这种对中国文字的看法其实是一种误读,德里达认为中文是不同于西方的“非语音中心,亦即非逻各斯中心”的语言,是没有考虑到中文中语音因素越来越多,实际上是在逐渐拼音化。这是对中国文字的误读而得出来的所谓的“洞见”。虽然不能完全断定德里达等人的解构主义理论含有中国文化的因素,但是中国文化对他们肯定是有影响和启迪的。虽然很多西方学者不懂中文,不讲自己思想的渊源,但其实好些西方文论流派的构型中就有中国古代文论的催化和促进用。20世纪西方文论,从现代走向后现代,从理性走向非理性主义,从中心走向边缘,在对文明的批判与反思的过程中不时地发现老庄思想的深刻与睿智。正如德国学者德国学者(Otto,2004)所说:“对于海德格尔,《老子》成了一个前行路上的避难所。”

曹顺庆等(Cao, 2001)认为,中国“虚实相生”话语模式对京剧表演艺术影响深远。而布莱希特正是从观看梅兰芳的京剧表演中受到启发,撰写了《中国表演艺术中的陌生化效果》一文,系统论述了戏剧的“陌生化效果”,奠定了表现派戏剧理论基础。而布莱希特的理论又反过来被中国戏剧界引进来。

寒山诗在美国的变异,既与文化过滤与文学误读紧密相关,同时也涉及译介学。曹顺庆(Cao, 2006:112)指出,译介学是比较文学变异学中研究语言层面的变异的分支学科,它关注的是跨语际翻译过程中发生的种种语言变异现象,并探讨产生这些变异的社会、历史以及文化根源。美国诗人Gary Snyder(Gary,1965)将寒山诗翻译成英文时,原诗“炼药空求仙”中的“药”,是指炼长生不老的药,本应该是与英语中的“elixir”相等值,但Gary Snyder故意用了一个易指涉到海洛因、大麻之类毒品的词“drug”来翻译,“炼药”被译成“Tried drugs”(嗑药),不能不说是一种故意的扭曲、变异,以迎合美国当时颓废的社会风尚与思潮,为“垮掉的一代”创造一位域外的精神远祖。但是,这个被美国解读出来的吸食毒品的“嬉皮士”寒山,已经离中国历史上的诗僧寒山相去不可以道里计矣。

西方人对中国文化(文学)的误读,有时令人匪夷所思,其谬以万里的荒唐更是令人啼笑皆非。Ezra Pound对中国文学和诗歌意象的创造性接受,可能是确实由于误读,也可能是出于对其本国诗歌现状的不满,对中国诗歌的乌托邦化。Ezra Pound(Ezra,1963)“借鉴中文”为现代西方诗学发明了“表意文字法”(Ideogrammic Method),虽然他本人宣称他对诗歌的贡献就是引进了表意系统,但是,Ezra Pound(Ezra,1972)对中国古典文化的解读,其实大多是不符经典的传统解读的,他把“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翻译成“To study with the white

wings of time passing/is not that our delight”。 “习（習）”字明显是被拆成“羽”和“白”两字，并发挥了庞德式的疯狂想象性的解读。Ezra Pound (Ezra, 1969) 把“缙蛩黄鸟”被翻译成“The twittering yellow bird, /The bright silky warbler/Talkative as a cricket”。这明显是把“蛩（蠻）”字拆成“丝”（silky）、“言”（talkative）和“虫”（cricket）。（Ezra, 1998）的这种令人目瞪口呆的误读，源于接受了Ernest Fenollosa的遗稿《作为诗歌手段的中国文字》中对汉字的误读：“（汉字是）记录自然运动的一种生动的速记图画”，“大部分原始的汉字，甚至所谓的部首，是动作或过程的速记图画”。Ezra Pound的这种误读，却开创了席卷全美的意象派诗歌，其影响辐射欧洲，甚至至中国，对中国的现代新诗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刘锋（Liu, 1995）认为，虽然无法确定中国朦胧诗一开始就受到了意象派等现代主义诗的直接甚或间接的影响，但在后来，这种影响无疑是存在的。郑敏（Zheng, 1982）指出：“北岛的诗在洗炼、精确、集中和富于感性魅力方面很接近庞德等意象派理论家所指出的诗的原则。”

中国的某种文学或文论，机缘巧合，因缘际会，漂洋过海被西方人删削增改变异之后，可能换了洋装，起了个洋名字，再重新被引进中国。对于这种源于中国、但又发生变异的理论重新回到中国，并被中国现代学界接受的情形，类似于Edward Wadie Said (Said, 1999) 的“理论旅行”，即“观念和理论从一种文化向另一种文化移动时，必然会牵涉到与始发情况不同的再现和制度化的过程”。

结论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到，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是有史实依据的，是可行的，其转化的方法就是变异。这种变异有主要发生在以“依经立义”为规则的传统基础上的，有主动吸收外国的理论然后遵循中国传统话语规则进行转化的，也有主要发生在国外的理论旅行后的回归。一般来说，前两种变异往往幅度较小，去“经”未远，后一种变异往往幅度较大，有时会谬以千里。但是不管是哪种变异，都给古代文论带来了发展的机遇。至少能让话语被当下言说。不用担心外国人是歪嘴和尚，他们基于自身的文化、习俗、知识、意图等所谓的前理解来理解或臆测，把中国的经瞎念一通，亦无可厚非。只要他们愿意了解学习中国文化，皆应宽容。曹顺庆 & 李思屈（Cao, 1997）认为，话语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现存物，而是在言说中不断生成着的东西，并且只有在言说中，话语才成其为真正的话语。沉寂类似于消亡，而每一次阅读，都是经典重新获得生命力的过程。因此，与其担心后人对经典的误读而将经典束之

高阁，成为秦砖汉瓦，不如鼓励大家一起来读。用变异的思维，在新时期、新语境中重读经典，常读常新，必将获益无穷。

因此，可以采用三种方式来对古代文论进行现代转化。一是以“依经立义”的文化规则，重读经典。因为每一时代的重读，都会发生变异，虽然可能幅度较小，但也是一种创新。而且重读经典这种行为本身，就是经典在新时代的一种存在模式，是保持古代文论生命力的一种必须的方式，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现代转化。当然，由于自古以来，我们对自己的经典都遵循“依经立义”的方式，决定了对经典的解读虽然有所变异，但是幅度不大。因为如果变异幅度太大，与当时的统治阶级利益相抵牾，则会被斥为离经叛道、异端邪说，并最终被历史所遮蔽。正如法国哲学家Michel Foucault (Foucault, 1999) 所说：“权力制造知识，权力和知识是直接相互连带的。”“依经立义”保持了传统的相对稳定，总体上反对激进的变异。当然，也可以运用创新性思维，对古代文论进行大幅度的变异。但是，如何保持一个合适的度，却是摆在每一位解读读者面前的一大难题。同是，当下最大的困境还是在于对传统经典的漠视。许多人不知道中国的传统文化，甚至连一些研究古代文学和文论的学者也没有真正通读过《十三经》、《诸子集成》和《文心雕龙》，这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

第二种方式，是在遵循“依经立义”等中国传统的话语规则的前提下，主动引进了西方文论的一些理论成分，对西方文论进行“他国化”，以中国的古代文论为主，以西方文论为辅，进行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但是不能用西方理论来割裂古代文论，因为那样只会造成传统的中断，使古代文论丧失生命力，而只成为西方理论的注脚，成为西方理论的一种异国证明，从而沦为西方的附庸，失去自主创新的造血能力，患上“贫血症”。所以中国的传统文化必须保持。引进西方理论，是为了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当代文论，西方理论应该成为材料，而不能成为框架。

第二种方式与第一种方式有时可能很难区分。因为在现今全球化时代的语境下，外来的思想、理论如潮水般涌入，很难保持一种真正纯粹的民族传统文化的真空。所以在第一种方式中重读经典，对经典进行阐发时，很难保证不渗入外来的思想或理论，也很难判断解读者是否受外来思想或理论的影响。正如上文论及王国维、宗白华、童庆炳等人对意境的解读和阐发，可归为第一种方式的例子的，但是也有人认为这几位学者在阐发意境这一古代文论的范畴时，都受了西方理论的影响，因此应该归为第二种方式。从实际情况来看，确实存在这样的问题。本文为了论述方便，故采取了此种相对简洁的划分。在实践中，可以不过分计较是否一点都未受外来思想的影响，对难以确证或受外来影响不明显的可划分为第一种方式；对明显受西方影响的可大致划分为第二种方式。

第三种方式，就是主动创造理论旅行后的回归。把中国的古代文论输送到外国，看会发生什么变异，然后再回收。当然，不管异国的反馈信息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都要心平气和，以实验与探索的态度从事这一工作，为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寻求新的路径。表面上看，有点类似于让外国人帮中国进行现代转化。实际上，这是让中国古代文论在一个完全异质的文化环境中经历挑战、碰撞，看看作为他山之石的潜能。也是一种从他者之眼看中国文论的策略。这既符合文化输出、增强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战略目的，也未尝不是古代文论现代转化的一种可行的方式。当然，对这种旅行回来之后的理论，不能照单全收、完全认可。因为西方人不可能遵循中国的话语规则来解读中国的经典，中国古代文学（论）必然会被异化，如果不加鉴别地回收，那和造成现在失语症的情形就毫无差别了。

References

- Cao, S. Q. & Li, S. T. (1997). Reconstructing the discourse of Chinese literature criticism. *Literature Review*, (4), 43-52. [in Chinese]
- Cao, S. Q. & Li, W. T. (2006). The study of literary variation i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Journal of Fudan University*, (1), 79-83. [in Chinese]
- Cao, S. Q. & Qiu, M. (2010). The westernization of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Journal of th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outhwest China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1), 229-236. [in Chinese]
- Cao, S. Q. & Wang, Q. (2008). The discourse reconstruction of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Literature, History & Philosophy*, (5), 5-12. [in Chinese]
- Cao, S. Q. & Wang, Q. (2010). The dialogue between ancient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and western contemporary literary theory. *The Contemporary Literary World*, (3), 4-10. [in Chinese]
- Cao, S. Q. (1995). The strategy of Chinese cultural development in the 21st century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Chinese literary discourse. *Oriental Periodicals*, (3), 223-237. [in Chinese]
- Cao, S. Q. (1996). Literary aphasia and cultural pathology. *Debate of Literature and Art*, (2), 50-58. [in Chinese]
- Cao, S. Q. (2005). *The study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Chengdu: Sichuan University Press. [in Chinese]
- Cao, S. Q. (2006). *A course i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Beijing: Higher Education Press. [in Chinese]
- Cao, S. Q. (2007). Cultural classics, literary discourse and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cademic Monthly*, (3), 100-105. [in Chinese]
- Cao, S. Q. (2008). Variation: a major breakthrough in the theory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Journal of Zhongshan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4), 34-40. [in Chinese]

- Cao, S. Q. et al. (2001). *Chinese ancient literary discourse*. Chengdu: Bashu Publishing House.
[in Chinese]
- Chen, X. (2003). A review of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ancient literary theory” since 1996.
Literature Review, (7), 94-100. [in Chinese]
- Derrida, J. (2005). *Grammatologie*. translated by Tangjia Wang, Shanghai: Shanghai Translation Press.
[in Chinese]
- Foucault, M. (1999). *Discipline and punish*. translated by Liu, B. & Yang, Y. Beijing: The Joint Publishing,
28. [in Chinese]
- Gadamer, H. (1999). *Truth and method*. translated by Handing Hong. Shanghai: Shanghai Translation
Press. [in Chinese]
- Han, T. S. (1986). *A letter to Li Minglu. in Zhou Lianggong. New designs of correspondence: first volume*.
Changsha: Yuelu Press. [in Chinese]
- Jiang, S. Z. (2008). A review of the study of ancient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for 30 years in the new period.
Academic Research, (7), 123-128. [in Chinese]
- Liu, F. (1995). Look at the influence of American modernist poetry on contemporary Chinese poetry
from Ezra Pound and T.S.Eliot. *Foreign Literary Studies*, (2), 33-39. [in Chinese]
- Poggeler, O. (2004). Let’s talk about Heidegger and Lao tzu. translated by Zhang, X. *World Philosophy*,
(2), 103-108. [in Chinese]
- Pound, E. (1963). *A collection of critical essay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Pound, E. (1969). *Confucius: the great learning, the unwobbling pivot, the analects*. New York:
New Directions.
- Pound, E. (1972). *The cantos*. New York: New Directions.
- Pound, E. (1998). *The Pisan cantos*. translated by Y. H. Zhao. Guilin: Liliang Press. [in Chinese]
- Said, E. W. (1999). *Edward Wadie Said’s self-selected essays*. translated by Xie, S. B. & Hang, G. et al.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in Chinese]
- Snyder, G. (1965). *Riprap and Cold Mountain poems*. San Francisco: Grey Fox Press.
- Tong, Q. B. (2002). *Discussing the modern vision of the study of ancient Chinese literature with Mr. Hu
Ming & Mr. Guo Yingde*. Chinese Cultural Studies, (The volume of winter), 1-8. [in Chinese]
- Tong, Q. B. (2002). The “artistic conception” is said in six different forms. *Dongjiang Journal*, (3), 1-9.
[in Chinese]
- Wang, G. W. (1940). *The Notes and Comments on Ci Poetry*. Shanghai: Kai Ming Book. [in Chinese]
- Wang, G. W. (1997). *The essays of Wang Guowei: first volume*. Beijing: Chinese Literature and History
Press. [in Chinese]

Wen, Y. D. (2002). *Wen Yiduo's academic essays*. Chengdu: Bashu Publishing. [in Chinese]

Zhang, L. X. (1983). No thorough interpretation for poetry. *Literature and Art Studies*, (4), 13-17. [in Chinese]

Zheng, M. (1982). *The study of poetry and drama in British and American*. Beijing: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in Chinese]

Zong, B. H. (1981). *Strolling in aesthetics*.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in Chinese]



Name and Surname : Fu Feiliang

Highest Education: Ph.D. in Literature, Sichuan University

University or Agency:

1. School of Literature, Southwest University
2. Faculty of Chinese Language & Culture, Huachiew Chalermprakiet University

Field of Expertise: Comparative Literature & World Literature

Address: No.2 Tiansheng Rd., BeiBei, Chongqing 400715 (China)

INSTITUTE OF MANAGEMENT

สถาบันการจัดการปัญญาภิวัฒน์